

# 一个女人的两代孩子

感念那些为自己的两代孩子倾情奉献的女人



《妈妈走的那一年》  
[美]威廉·麦克斯韦尔  
南海出版公司  
2016年5月

好女人的心总是一头连接着丈夫，一头牵挂着孩子，尽己所能扮演好妈妈和妻子这两个角色，再谈其他。在这种女人的心中，丈夫不仅是丈夫，还是自己的大儿子。

小说《妈妈走的那一年》中，麦克斯韦尔借孩子们的视角，描述了妈妈逝世时内心的微妙起伏，以及他们眼中成人的悲伤。

邦尼和罗伯特兄弟俩对妈妈的心态截然不同，也可以说是天下儿女的两种典型。邦尼将妈妈视为生命的中心，她的一个关注就能改善心情，而一次忽略也能创伤心灵。所以说，孩子的童年不容忽忽，他们心中常怀疑父母是否真的爱自己。而儿时的印痕又是最难忘却的，也最能影响人的一生。罗伯特是一个腿有残疾但性格倔强的男孩，他持相反态度，自己应承担起保护妈妈的责任，让她免受伤害。对孩子来说，邦尼的心态要普遍得多。

正逢流行病肆虐，朝不保夕，这一家四口几乎陷入了恐惧之中。邦尼莫名滋生了一个可怕但寻常的设想：如果妈妈不在了会怎么样？人生就像失去了一道屏障，围不住温暖和安慰，又挡不了悲伤和困惑，总之纷扰不断，那时的自己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不幸最终还是降临，流行病真的夺走了他们挚爱的妈妈。邦尼在哭泣，罗伯特在自责，而一贯严肃的父亲，也赫然惊觉原来妻子才是家庭的基石，没有她的日子无法接受。全家一度陷入沉痛的失落中，但麦克斯韦尔并未在此处费过多笔墨描写至亲逝去的哀痛（很多时候，神态不显悲痛，内心更显哀伤），他另辟蹊径，挖掘细微的人物心理，并通过文字传达出来，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走进书中人物乃至麦克斯韦尔本人的内心世界。

相较于麦克斯韦尔的另一部代表作《再见，明天见》，本书沿袭了固有的清新、朴素之风，也同样是麦克斯韦尔自身的经历为蓝本，比如本书中的“幼年丧母之痛”，他说：“关于我母亲的死，我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永远。”这无疑为作品填充了独特的情感。

坦白说，麦克斯韦尔塑造的这个妈妈，质朴、平和，带点瑕疵，却能给人一种真实又温馨的归属感。行文采用散文式的笔法，故事没有使用技巧，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仿佛是一部流水式的生活日记，且文字平实温润，波澜不惊，传递出一种简单但通透的柔和感。阅读本书，宛如将自己置身于一段品茗闲话的静谧时光，却又已然沉浸其中，渐渐勾起我们早已淡薄的儿时记忆。

关于妈妈，我们总有太多的话语不敢诉之于口，如鲠在喉，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也有太多迟到的行动，等到斯人远去时，便只能留下想念，如本书中的父子仁——每天每天都想念。感念那些为自己的两代孩子倾情奉献的女人。  
阿迟邦崖

#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寻找并保全内心自由

他的一生虽未明确表示归属于某个特定的派别，但他自始至终都属于他自己

悦读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奥]斯蒂芬·茨威格  
三联书店  
2016年4月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466年10月27日—1536年7月12日），史学界俗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是中世纪尼德兰（今荷兰和比利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为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其一生始终追求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被誉为“16世纪的伏尔泰”。

人为万物灵杰，假万物而君之，而绝不为万物所驱，谓之自由。此为辉煌。可是事实上，伊拉斯谟前半生为求得生存，不得不依附于贵族权势；他未有获得健康的体魄，不得不囿于斗室，惧怕激烈与狂热；他的精神自由之国度是用笔杆子建立起来的乌托邦，而且最终湮灭于世人的疯狂与暴力之中。此为悲情。斯蒂芬·茨威格寥寥几笔，这个在茨威格人生困窘之时的“救星”，便带着那个年代的辉煌与悲情跃然纸上。

时过经年，我对《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感触最深的，还是伊拉斯谟的自由。他的自由在于他拥有足够的学识，以至于不必担心困惑，而能见人之所未见，明人之所未明；他的后半生拥有足够的金钱，以至于不必担心窘迫，而能著书立说，指引世人。他的一生虽未明确表示归属于某个特定的派别，但他自始至终都属于他自己。

在1933年11月8日，《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成书之前，托马斯·曼曾经写信给茨威格说道：“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这位文学界的大师，同样也是茨威格的挚友，以“神话”来赞誉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也确如托马斯·曼所言，斯蒂芬·茨威格的很大一部分成就来源于他的传记作品，例如他还为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拿破仑一世时期的警察部部长约瑟夫·富歇以及哲学家蒙田等写过传记。而这部关于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作品，则是茨威格在1934年与出版社发生决裂之后所出的第一本书。

这次决裂只是茨威格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面临的无数麻烦与困惑的写照之一。茨威格已经明了，作为一位犹太作家，想要获得更多的德语读者群体已经是愈发艰难。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在他的作品最终彻底消弭于图书市场之前，利用这本有可能成为他最后的出版物的传记，有意识地对纳粹进行批评。

一直以来，茨威格都对在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非常感兴趣。对他而言，直观而又简洁地描述这个人的生老病死和人生起伏盛衰绝对不够。他还要尝试用解构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人物的一生，尝试去解读这个人如何会成为一个如此重要之人，究竟是哪些动因导致了这个人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如此行事。

茨威格认为伊拉斯谟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自己所处的环境非常相似。茨威格在与罗曼·罗兰的书信往来中写道：“在400年前，我的朋友伊拉斯谟就已经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了。”茨威格在1934年6月10日如是说，并且预言了即将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些被作者茨威格反复暗示的相似平行之处，在《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一书中几乎无法忽视；茨威格似乎是跨越百年岁月，超越了当时当地的历史语境，在伊拉斯谟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林晓萍

# 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

对于暴力这一痼疾，我们并没有什么万灵药

好书我读



《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  
[美]兰德尔·柯林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6月

仅2015年，全球各地的武装冲突就轻易夺走了超过18万人的生命。而五年前，这个数字仅为4.9万。从叙利亚到尼日利亚地区，难民、恐怖主义和日益升级的武装冲突等问题使这个世界变得愈发暴力了。但是，“对于暴力这一痼疾，我们并没有什么万灵药。”

“冲突论”鼻祖、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一书从微观社会学角度出发，借助视频录像、民族志调查，近距离剖析暴力发生时的微观情境。

暴力分为许多种，形形色色的暴力可用一个相对简洁的理论来解释。若干主要过程，加以不同强度，便达成了不同形式的暴力在特定时间和情境下发生的条件。柯林斯认为，“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也“正是这些情境塑造了深处其中的个体的情绪和行为”。在书中，柯林斯以互动为核心分析暴力情境的特点。他强调，尽管“年轻男性最有可能成为各种暴力行为的施加者，但却并非所有年轻男性都是暴力的。在合适的情境下，中年男性、儿童和女性也可能是暴力的”。相反，即使我们认为非常暴力的人群（比如，多次犯下凶杀、抢劫或者强奸的暴徒），他们也仅仅在特定的情境下才是暴力的，或在某些场合下格外暴力。

人类的本性并不是触发暴力，而是在互动中逃避和弱化真正的暴力；因此，与其说社会制度的主要功能是阻止暴力，倒不如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鼓励暴力乃至将其制度化。如果斗殴在属于敌对群体的个体之间爆发，其他群体成员就可能加入其中，使得斗殴扩散（比如，足球队球迷之间的暴力事件，等等）。柯林斯认为，暴力情境能够适用于不同个体，“暴力个体”却并不适用于不同情境。不同形式的暴力有着共同的特点：暴力实施者必须克服情境中的紧张与恐惧，才能顺利实施暴力。有些暴力会去寻找软弱的受害者；有些暴力会通过制度化的规则与纪律来压倒紧张与恐惧；有些暴力会从围观者身上汲取情感支持；有些暴力则会通过双方的心照不宣来让暴力成为一种表演。柯林斯强调，“这种斗殴具有很高的组织性，正是这种组织性使得个体战胜了普遍存在的、使得他们远离斗殴的恐惧。如果不是具有强大的组织性，大规模斗殴根本不会发生。”

一切的暴力或暴力冲突皆源于欲望或“内心的恶”，这才是暴力的本质。从动物本能看，暴力或暴力冲突明显是初等级动物世界中的应急行为，受到刺激后马上会有反刺激。而人类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行为，一是不少人没有内心的自我控制，二是社会没有基本的纾解暴力情绪的窗口，最终使人的行为逐渐地倾向于动物的本性。

柯林斯建议，“不同的暴力机制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比如，考虑到年轻人流行文化中的叛逆倾向，可能会有许多人选择去破坏规矩，如果无法或没有可能让所有人都遵守良好的行为准则，那就将“某些种类的暴力强度降低，用相对温和和仪式性的暴力形式来取代严重的暴力”。  
刘英团